

從激進到基進：一位小學教師教學歷程的轉換

陳鴻文

宜蘭縣光復國小

教師的教學工作，深受學校文化的影響。同樣的，學校文化亦會隨著教師的加入而產生質變。教師個人所具備的身份，經驗，觀點，特質與學校文化的交互影響，其實也就是教室的放大版本。本文探討作者經歷的三所學校的文化洗禮，及個人的多重身份轉變後，重新反思自己從事教育的初心。

關鍵詞：教學歷程，轉換

勿忘初心

「搞學運」曾經是我在高中時期，為追求進入大學的唯一理由。然而，時隔多年，當我的社會身份逐漸增加，由狂飆的憤怒青年、莘莘學子、小學的初任教師、學校行政人員、父親、實習老師的指導老師…等等，多重角色的經歷讓我有更多的視角來檢視我如何「讓世界變的更為美好」的初心。

懷念葉老師

這些的思考或轉折讓我從葉老師（化名）談起。大四快要畢業的時候，我曾參與學校實習運動會的籌辦工作，由於籌畫的時間很長加上繁複的討論，讓我和當時的葉老師互動頗為頻繁。葉老師早期在學校是擔任體操老師及教練的角色，後來學校的體育館被燒掉之後轉而指導學校的桌球隊。關於葉老師的傳聞很多，學長姐總是說他帶體操隊的時候經常在體育館練到三經半夜，以嚴格出名。當年花師專在大專運動會的乙組體操項目曾經拿過 41 面差一點大滿貫的成績⁽¹⁾。我們大四修體操課的時候，葉老師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要我們在司令台上做器械操，而他則是坐在操場的另一端喝著伯朗咖啡，嚴厲的說「不行..不行。重來！動作捏捏捏捏，聲音也不夠大，如果全校的小朋友都在看著你，這樣的表現在丟人現眼。重來！」在這樣一遍又一遍的「重來」聲中，大家在炙熱的畢業季節中揮汗如雨的重複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過，葉老師另一個讓大家好奇的事，就是他一年四季，無論晴雨都是一身白色的穿著。從我進花師到畢業四年來都是如此，這個疑問始終存留在大家心中，連我桌球隊的同學也不敢問他。直到大五我考上師大體研所回學校和學弟妹座談，會後他載我去亞士都吃飯的路上，我終於忍不住問了他這個問題：「老師，你為何總是一身白色的穿著呢？」在那次的談話中，有許許多多令我難忘的回憶，不過葉老師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因為白色的衣服容易髒，而且一有污點就很容易讓人家看出來，所以白色的穿著會讓人格外注意自己的儀容舉止。更甚者，人的行為和人格不就像是白紙一樣不允許有任何的污點。白色衣物的穿著雖然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一件簡單的事堅持久了，就是一種原則，一種美了。」這樣的回答對當時的我而言確實是一大震撼，因為我無法理解一位老

師的穿著背後竟然有著這麼大的思考存在。而一直到葉老師 50 歲退休，從事教學生涯 25 年來，葉老師跟我說他從來沒有一天違背過這個原則。在教書越來越久之後，我逐漸懂得一個道理：「原來越是簡單的原則，越不容易堅持。」

20 年後的約定

在我退伍回到原分發的學校服務後，學校來了一位新的王校長（化名）。王校長是一位辦學認真，很清楚瞭解老師教學之所需，以及學生學習之所要的校長；除此之外，他也是個很肯為老師學生爭取權益的人。王校長生性浪漫，我退伍回學校的那年暑假接任訓導組長，因為暑假營養午餐停辦，學校又地處偏遠，王校長經常在中午的時候跑去附近的 7-selven 買涼麵和啤酒回來，我和他就常坐在辦公室外的階梯上一邊吃著涼麵，一邊暢飲的生啤酒，遠眺對岸的龜山島度過脫離軍旅生活的第一個酷暑。後來班上來了一位受家暴的學生，王校長和我時常到他家去探望關心孩子的狀況，最後透過王校長的關係幫他轉介到寄養家庭。在從社會局回學校的路上，王校長感慨跟我說：「如果要評量小學的教育成不成功，其實不應該是看孩子現在的學業成績，而是在未來 20 年後眼前的這些孩子能否成為稱職的父母親，這才是教育工作者應當關注的課題。」我認為這樣的教育願景從一位校長的口中說出真是令人動容，從此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對，沒錯！教育如果是百年大計，那麼我們的確是需要有把眼光放長遠的人來替我們掌舵。而我們所需要的就應該不只是在學生的學業成績上來打轉而已。

我是用這種風格活著！

身為一位小學教師，從教學的角度而言，我很喜歡在教室現場內和學生互動的感覺。宋文里在〈再現青少年〉一文裡曾提到：「教室裡可能發生的，難道不是我們對於真實的最後保障嗎？」(p.26)的確，在我有限的教學經驗中，我很願意相信即使當外面世界一片漆黑時，教室還是可以有一盞小燈來維繫這真實的最後一道屏障，讓我們不至於被黑暗所吞噬。2004 年的暑假，我陪著老婆一起去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進修，和她們一起上課的過程裡，我無意中

讀到了大江健三郎在《爲什麼孩子要上學》裡，引了夏目漱石在《心》的兩句話。「請好好記住，我是用這種風格活著。」(p.18)；「當我的鼓動停止時，如果有一個新的生命在你的胸中停駐，我就很滿足了。」(同上引)這是在《心》一書中，一位被叫做「老師」的人對年輕人所講的一段話。這兩句話一直在我心中繚繞，也慢慢地影響著我對教師這個工作圖像的想像。到底除了對個人生業的維繫之外，老師，或說一位小學教師，這個屬於「助人的行業」到底如何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害怕沒有表情的教育

我很願意相信「教學是一種行動的知識。這種知識涵蓋了觀念的理解、價值判斷、和實踐的能力。這些能力都不是一個人可以從消極或被動的複述他人理念與模仿他人行爲可得，而是從反覆的思辨學理與生活世界的關聯跟意涵中，日漸培養而得。」(廉兮，2004)所以，在實際的教學現場中，我不怕喜歡調皮搗蛋，愛跟我開玩笑的學生。如果在教室裡還有這些「互動」的話，至少證明「敢搗蛋」的學生，心還在教室裡，愛跟我開玩笑的舉止，反而讓我知道我並沒有把他們教笨。我最害怕的是學生一臉的茫然與冷漠。這讓我想起大一時有一次在上教育心理學的時候，朱老師(化名)要我們講一件自己在求學期間印象最深刻的事。班上有幾個男同學是退伍後才來讀師院，每每談起他們的求學歷程總是講的口沫橫飛，說他們是如何千辛萬苦、幾經波折才能來讀大學。有的國小讀七年，國中讀四年，高中讀五年，大學考了四次…。聽他們敘說著自己的故事時我總是覺得好笑又有趣，但是輪到班上的某中一位女生發表時，她竟然說：「我沒有印象最深刻的事！」老師要她仔細的再回想一下，不一定要印象深刻的事，只要在你自己的求學過程中任何一件你覺得有趣事也可以。不過，她的回答仍然是「沒有！」當時我著實覺得驚訝，爲什麼一個人從小到一個故事也沒有。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麼他的生活不是太乏味無趣了嗎？還是我們的教育太過於僵化，死板到沒有任何的喜怒哀樂，是沒有表情的教育。即使到了現在我依然記得她說「沒有！」時候的表情。這件事至今仍在我的內心反思著，希望在我的教學歷程中，學生至少可以感受了趣味與欣喜，而不是冷漠與平淡。

教室/學校/小學老師

在目前 13 年的教書生涯裏，我一共經歷過小、中、大三種類型的學校。在師院畢業分發後，我第一所初執教鞭的蜜月國小（化名）。她只有六班位在宜蘭縣北邊的小漁村、學生數大約只有 100 個人，家長們的社經地位普遍低落、單親隔代教養嚴重，是屬於文化刺激不足的地方。雖然外在條件如此，不過對我而言在蜜月國小教書的日子卻是目前影響我最深的時期。在學生人數少，升學壓力也較低的情形下，只要你對課程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有嘗試的空間。在和學生之間的相處上，你不僅是他們的老師，更甚者同時你也扮演著父兄的角色。所以當我在閱讀《校園生活》時，我有一股感覺是 Peter McLaren 所描述的教學情景大概也類似蜜月國小的縮影。有一次主任要我們調查班上有關單親及隔代教養的學生人數時，一位老師居然說：「乾脆問看看在這裡家庭環境正常的有幾個人較快吧！如果仔細精算的話大概十根手指頭都數不完。」不過，這對我卻反而是一種體驗與理解，瞭解在社會中並非每個人都享有充分的教育資源，學校的教育如果缺乏批判與反省的話，很容易就流為階級「再製」的場所。但如果我們真的願意把教育當作一種志業，那麼學校才有可能成為促進階級流動的地方。有一次我在寫給一位老師的mail中提到：「我終於可以實現年少時的夢想了，因為在這裡無須經由衝突就可以從事我所嚮往的社會運動。如果我們願意用心放長遠去看，把每一位學生帶好這便是最基礎的國民教育。這樣的工作何嘗不是比從事社會運動需要更多的熱情與心力呢？原來我年少時的夢想，如今就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也就是因為如此，當我拿到碩士學位時，大多數的同學都有機會轉換跑道前往高中任教，不過我卻堅持回到小學的教育現場實踐我自己對教育的想像。宋文里在〈敘事與意識：另一個對話的位置〉一文中也曾提到「我參與過的『社會運動』實在不多---假若社會運動真能有個通俗的定義的話。每次碰到來自各種抗爭運動份子的邀約，我總是說：我的運動場在研究室而不在街頭。」（pp.158-9）我想自己一路以來從大學、研究所到博士班所受的教育訓練都是在師範體系理完成的，這不也隱約的說明了一點，那就是自己的專長或暫且稱之為專業的養成吧！無非不就是要成為一位稱職的小

學老師，那麼我的戰場呢？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就是在學校中，教室裡願意與學生長時間的陪伴並與之糾纏的關懷。

星星國小的人馬！

6 年後，因為結婚的關係。我調到了宜蘭縣的星星國小（化名）。這是一所 22 班的中型學校，雖然位於宜蘭市內，不過卻是社區老舊，人口逐年外流的學校。在星星國小的這一年，我主要是擔任課程研究組組長及兼任四班五年級的社會課。因為曾在三峽教師研習會研習過兩個星期的九年一貫課程，以及在國北師課程所修課的經驗，所以我對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並不陌生。倒是要化解老師與行政之間的不信任才是最為棘手的問題。由於是剛調入的關係，我並沒有捲入學校先前的各種紛爭。不過因為職務的緣故，我必須負責編寫學校的特色課程，因此我嘗試著扮演行政和教學之間的橋樑，讓老師「願意」動起來。因為我相信任何的課程改革如果沒有老師「有意願」的加入，那麼她的失敗是可預期的。就如同 Burner（1996/2001）在《教育的文化》一書所說：「任何一種教育改革，都不能不以成人積極而誠實的參與為基礎----也就是說，要心甘情願且準備十足的老師，來給予和分享，來安慰和支持。...而在教育的努力之中，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教師帶進教育的論辯，帶進變遷的化成。因為教師就是變革的終極行事者。」（pp.136-7）在推動課程編寫的過程裡，我有一個小小的心願是：「希望在這一波的課程改革中，教師的聲音可以被聽見，即使是一向沈默的小學老師在和課程改革的浪潮遭遇時，不至於載浮載沈而是能夠御浪而行。」然而，在經過了幾個月的試煉之後，我逐漸瞭解到在課程改革的大脈絡裡，老師們雖然不理解、不諒解，倒也還能嘗試性的去做些新東西。只是，在行政和教師，以及教師和教師之間的關係脈絡裡，彼此的信任就猶如履深淵、臨薄冰的危險。學校沈苛已久的對立一觸即發，掩蓋過教師對課程的能見與想像。我雖然兼任行政職務，卻堅持替老師說話，這樣扞格與矛盾的立場，總會讓人不斷去揣測我到底是哪一邊的人馬？在被問煩了這類無聊的問題之後，我總是說「我是星星國小的人馬！」。

利益交換的共犯結構

有一次運動會預演完後，我受不了學務主任的慌亂，毫無準備的做事態度，一會兒要學生在東側集合，一下子又把要表演的學生叫喊到西邊去準備。學生們等待枯坐、無所適從、抱怨聲不斷，就連老師也氣得跳腳，沒有章法的跑龍套讓整個運動會的預演像是一盤散沙。在檢討會上我起身痛斥「這大概是我有史以來見最差勁的運動會，之所以最差並不是因為老師學生表現的不夠好，而是負責規劃的行政人員沒有盡到該有的責任。難怪星星國小在宜蘭市的小學裡總是被人家看不起！這樣的做事方式不僅讓老師們不能認同，就連身為行政人員的我也嗤之以鼻。」學務主任不滿我的指責，也在檢討會上說：「那請經驗豐富的陳老師你說說看到底有哪裡做不好啊？」我說光在開始集合的時候，老師學生們連自己班級的休息區在哪裡都不曉得，當然會亂啊！至少在預演前一天可以用小三角錐標示各班的休息區，而不是沒有事前規劃，當天兵荒馬亂才又對學生老師亂發脾氣，這樣是自己有虧職守又將過錯推給老師和學生，難道不應該檢討嗎？學務主任當場氣得臉通紅卻又說不出話來。私底下老師們都跑來跟我道謝，說我那天說出他們積怒已久的心聲，幫他們出了一口氣。只是我心想，我是個剛調進來的新老師，見到如此難以忍受的事說出我的看法而已。我並沒有要幫誰出氣的意思。而且老師們在學校裡都比我資深，經驗也比我豐富，為什麼遭受到不合理的事實卻又莫不吭聲呢？

後來，隨著在星星國小的時間越來越久，我也越來越瞭解為什麼事情會這樣發展。和我同一年進去星星國小服務的老師有四位，除了我是現職老師的調動之外，其餘有一位是公費生分發，另外兩位則是學校教評會自聘進來的。就當時的外在環境而言，小學的教師甄試已是一位難求的情況之下，隔年又即將要面臨減班超額的星星國小，卻又新聘了兩位新老師不免令人覺得事有蹊蹺。爾後，我當選該校的教評委員，我才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兩位新進的教師中，一位林老師（化名）是星星國小畢業的，回到母校實習後，順理成章考上星星國小的正式教職。另外一位卻是患有躁鬱症的潘老師（化名），潘老師嚴格算起來是花師初教系小我三屆的學妹，就學期間因為躁鬱症曾休學一年。畢業後代課抵實習那年，又因為無法勝任教學工作被家長檢舉而終止代課轉任實習教師，最後因為姊姊認識星星國小家長會的副會長在教師甄選中「運作成功」⁽²⁾

因而順利甄選進入月光國小。除此之外，學務主任的女兒也要回來星星國小徵聘英語代課教師，因這一層層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資深老師與學務主任之間有著既合作卻又相互對立的矛盾情節。就某種程度而言，我認為這是學校利益交換的共犯結構，所以當籌辦運動會的學務主任無所做為又亂罵人時，資深老師的也只能悶不吭聲的把怨氣往肚裡吞。

是殺手，不是打手！

只是潘老師的教學依舊是紙包不住火，開學沒多久就時常接到家長抱怨的電話。有一次我要往四樓五年忠班上社會課時，發現潘老師班上的一年級的小朋友在教室內外追逐，當時，這是我教書這麼久以來，第一次我踏進入別班老師的教室維持秩序⁽³⁾。然而尷尬的是當我安頓好學生要離開的時候，卻發現潘老師躲在教室的牆角茫茫不知所以然。學期末家長們按耐不住，集體來學校要求處理潘老師的事。校長決定讓潘老師舉行教學觀摩來向家長說明自己的教學能力，只是沒想到第一場的教學觀摩剛開始潘老師就楞在教室的講台 40 分鐘一句話也沒講。隨後，我要求學校召開教評會來討論潘老師的去留問題，而沒想到這卻是一個碰觸學校禁區的地雷。資深老師們在教評會上說潘老師是新手第一次教學觀摩難免會緊張，而且又有攝影機在場，表現不好是人之常情，不能一次定生死。我無法接受這樣的論調。我說潘老師是經過層層關卡考進星星國小的合格教師，而且又是接受了四年的師資養成教育，連基本的教學觀摩都無法勝任，在課堂呆若木雞沒講一句話，這樣的表現豈止是失常可言。大家一致的維護潘老師，摸著良心說黑話，那學生的學習權在哪裡？我的大聲疾呼猶如狗吠火車，最後教評委員們決議兩個星期之後要潘老師再實施一次教學觀摩，看其表現再做決定。沒想到這卻是災難的開始，沒有人針對潘老師的教學做出討論，有的卻是放話說我和教務主任是校長要排擠潘老師的打手。我一笑置之的向他們回應說：「我如果是的話，那我會是殺手，讓你們一槍斃命，而不只是打手，讓大家還有苟延殘喘的機會！」

對天賭誓！

只是我內心煎熬，這和我當初唸完碩士準備回學校投身田野實踐的期望有著難以言喻的落差。猶有甚著，那時候我自己的小孩剛出初生不久，當了父親之後的我更親身經歷的理解到一個生命孕育過程的艱辛與偉大。我時常會去想每個小孩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從小拉拔到這麼大，花了多少的心血。父母把孩子們送給學校，信任我們的專業，期盼孩子們受到是教育的啓蒙。然而，如果讓他們知道教育背後的實情，那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情何以堪。在一個月後的教評會上，潘老師最後以 8：5 的結果繼續留任。在表決前我要求主席希望記名投票，讓大家為孩子的受教權負責，並把我們的發言錄音。我說：「現場的老師有許多人都有宗教的信仰，然而複製輪迴不就是從教育開始嗎？如果我們稍微熟讀一下教育心理學的話，我有十足的自信可以根據當代的教育理論來說明一位孩子在學校所受到的教育對他的未來會有多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會隨著年齡越小而影響越深遠！我們常說教育工作是良心的事業，是具有反身思考的價值，那我們就直指內心的去反省當初潘老師是如何考進來這件事。學校是教育單位，應該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生的權益為最大的考量。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我真的願意相信會有輪迴這件事，而且從現在就開始！因為複製的因就在潘老師課堂教學中不斷展現，而果呢？就反映在學生的偏差行為及低落的學習成就上。」儘管我激動的說詞在會議上掀起了三十尺高的滔天巨浪，但老師們卻一如往昔平穩安靜的投下信任票。我沒有憤怒只是難過的當場辭去教評委員一職，不願為這樣結果背書。令我不解的是結果出爐後，潘老師因為躁鬱症發作連續又無預警的請了三天假，學校的人事主任竟然說是我們要逼死她，多積點陰德，得饒人處且饒人。聽到這些話，我實在氣不過當面跟他說：「要逼死她的是當初用齷齪手法聘她進來的人，明知到她無法勝任教學工作，卻硬要她做這份差事，把她和學校搞成這樣。我願意把我所參與和潘老師有關的會議紀錄、發言及表決的書面資料，錄音帶等證物，和你一起拿到城隍爺面前對天賭誓，我憑著良心做事沒有一絲一毫愧對星星國小。你敢不敢？」人事主任當場臉綠了一半，無話可說。但我沒有絲毫的痛快之感，有的卻是萬念俱灰與身心俱疲。我心中迴盪著：「你們這些教育裡的偽善，果真是披著羊皮的狼！」

別忘了，理性批判之外…

1年後，因為減班的關係，我反而被超額到宜蘭市區的月光國小。這是典型的大型明星學校，學生有45%是從外地越區來就讀的，學校已經106年的歷史，各項社團、藝文比賽或體育競賽在宜蘭縣甚至全省都是箇中翹楚。家長對學校事務的參與十分熱絡，而學生的素質與壓力當然也不言可喻。第一年我是擔任五年級的級任老師，雖然我在蜜月國小也曾擔任過兩年的導師職務，不過感覺上那時在教學經驗與理論的閱讀都不足的情形下，大多是邊做邊學，在教學上談不上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來到月光國小後我才覺得自己真正進入了以教學為主的教室現場。一方面是無需負擔教學以外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外就是自己當了爸爸。在這之前自己的教學永遠都是在教別人的小孩，當了爸爸之後我自己常常去想要讓自己的小孩要受怎麼樣的教育，而我可以給他什麼樣的教育？或者是說，有了孩子之後，我從一位教學的生產者開始去思考轉變成一位教學的消費者。我也不斷的在教學生產者與教學消費者這兩種對立的身份中穿梭，在這樣的對照下來思考理解更深層的教學意涵。而這不只除了有理性的批判之外，還帶有對於孩子的愛與關懷。不過，在月光國小這種明星學校教書，如果沒有深刻的省思，很容易會陷入一種迷失：「誤以為世界真的就如此的美好。」因為這裡的學生程度很好，無論行為上、課業上，對自我的要求都很高。家長大都是社會上的中產階級，對學校的參與及認同都很積極踴躍。對照之前我所待過的蜜月國小及星星國小而言，這是很奢求的教學環境。因此我也常提醒我自己，並不是大多數小孩都能有如此良好的家庭環境與教育資源，別忘了還有許多在社會邊緣成長的孩子。

花東鐵馬騎行：一個把套裝知識和經驗知識扣連的經驗

2004年的秋天，我參與了一次文化局所辦理的單車自助旅行的研習。主講人是Vicky跟Pinky。她們兩位女生從1998年7月到2001年11月歷時922天，騎著單車，雙腳踩踏過卅二個國家，遍訪五大洲，完成了單車環球的夢想。深深的印證了古人所云：「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的道理。在教室的學習歷程裡，除了教授教科書上的套裝知識外，我更在意的是我們如何透過學校的課程讓著孩子去連結他們的生活知識。我認為，雖然套裝知識雖然受到許多的批評，但它有個很大的作用在於——它是可以成為提供學生瞭解自己經驗知識的「工

具」。但工具能否成爲利器，端賴老師以何種教學假定來運用套裝知識----可以弄得非常呆板枯燥，反覆背誦知識教條的訓令；但也可以讓它成爲觀看個人如何嵌入在歷史/社會的結構中，來理解「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所以在「閱讀、旅行，與運動」的生活經驗中加深加廣，一直是我教學的核心價值。除了享受在這三者之間位移的經驗與樂趣外，也是我奉行不渝生活哲學。

在課堂上我跟學生講述她們兩位女生的故事時，自己也深受感動。我想就如Paulo Coelho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所說：「沒有一顆心會因爲追求夢想而受傷，當你真心想要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2005年暑假，我和同事嘉偉決定花了五天的時間，暫時遠離校園的生活，從花蓮以單車自助旅行方式到台東。這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出發前我們沒有太多的計畫，不過我會願意去想像這之中的歷程應該會有一些驚喜。就如同大學時期王浩威醫生告訴我的：「我們不只要讀經書，還要一起去辨識鳥獸草木；不只是尋找自己的認同，還要用血肉身軀去撞擊且質問一切賦加在身上的身份和歸屬。真正思考的獨立是要重新思辯的，特別是擺脫以往知識的既有地圖，重新與整個土地對話，然後在對話中尋找新的經緯和座標。」在山巒綿延的花東縱谷裡我和嘉偉大多數的時間都是「日出而騎，日落而停」，有很多的時間可以發呆，可以沉思，和自己對話。會選擇單車作爲旅行的交通工具，是因爲它可以讓我們更親近自然、深入人群，和當地人用相同的頻率生活；另一方面，也許這種古典的方式，能拋開較多的物質享受和對文明的依賴，讓自己的心更無掛礙。生活更簡單，心靈反而更自由。在旅行中的雜記裡有我寫著：「『遠山含笑』、『天人合一』，大概就是這種感覺了吧！往富里的途中，天氣因接近黃昏而十分宜人，可以看見兩旁青翠的山色及分別開往花蓮及台東的火車，這種感覺好極了，有股不知名的感動。在縱谷騎行遼闊之感直上心頭，讓人覺得人真的是非常的渺小。投入大自然中騎行的體驗實在很微妙，遠離塵囂和工作的環境完全的隔絕才會有沈靜的感覺，也才能醞釀儲存再回教室現場的活力。」開學後我和嘉偉把所有單車旅行的資料和歷程整理成電子檔，利用兩次週五綜合活動的時間，用對談的方式和學生分享這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我告訴學生：「如果你還沒有機會去旅行，至少你可以藉由老師的眼睛去看世界。」拿著套裝知識

的鑰匙撬開更為寬廣的經驗知識，在課堂中活生生的呈現，是我願意嘗試的努力。

回到初心：從激進到基進

從一位渴望學運的少年，一路上跌跌撞撞成爲「老師」的歷程中。激情好像慢慢消褪，但基進（radical）⁽⁴⁾ 依然。革命雖然在我們的這個世代似乎沒有發生的可能，但我知道自己卻是可以把「讓世界變的更爲美好」的初心，轉換戰場在教室/學校的教育場域中實踐。

註釋

- (1) 我想葉老師如果現在還有在指導體操的話，那麼他應該是花師版的「翻滾吧！男孩」。
- (2) 92年宜蘭縣的教師甄試，縣政府教育局並未舉辦統一甄選會辦理初試，仍是委由各校教評會自行開缺自行遴聘。潘老師透過家長會副會長的運作，結合學校的幾位資深老師在教評會甄選時先將潘老師打成最高分，再將表現優異可能甄選上的老師故意評爲低分，拉開彼此的差距讓潘老師順利得以遴選進入月光國小。
- (3) 在教師的文化中，踏進別班教室去維持秩序，有點侵入別國領土去指揮的味道。
- (4) 「激進」，其意涵接近偏激、極端等不平衡的心理狀態。蠻適合描述我年少時對於社會、政治不滿的憤怒。然而隨著年紀漸長，多重角色的身份經歷。我認爲基進（radical）一詞，所指涉與權威體系不同理論立場與社會位置的概念，反倒適合現在的我。（關於激進與基進的詮釋，參見傅大爲《基進筆記》pp.3-5）

參考資料

- 大江健三郎，陳保朱（譯）（2002）。爲什麼孩子要上學。台北：時報文化。
- 宋文里（2000）：〈再現青少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青少年人格建構研討會」。（台北市）宣讀之論文。（6/10/2000 修訂版）。
- 宋文里（2002）：〈敘事與意識：另一個對話位置〉。《應用心理研究》（台灣），

16 期，157-165。

傅大為（1990）：《基進筆記》。台北：桂冠。

廉兮（2004）：〈多元文化教育導論課程目

標。 <http://www.nhlue.edu.tw/~gimewww/private/schedule/93-1term/93-1-22.htm>

布魯納（Bruner，J），宋文里（譯）（2001）：《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學的觀點》。台北：遠流。

保羅·科賀爾（Paulo，C），周惠玲（譯）（2004）：《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

作者簡介

陳鴻文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宜蘭縣光復國小教師

通訊處：260 宜蘭市泰山路 60 號

電話：0935683635

E-mail：edword1975@gmail.com

From Radical to Original: A Teaching Process Transformation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Hong-Wen Chen

Guang Fu Elementary School of I-Lan County

A teacher's teaching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chool culture. Likewise, along with new teachers' infusion come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of school cultur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background, experiences, viewpoints, personalities and school culture is exactly the enlarged image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re-thinks & reflects the initial intent of being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after experiencing three-school's culture and multiple identities.

Keywords: teaching process, transformation